

画译中的纪念

高
莽
著



高

莽

念
的
中

画译中的纪念

译画

纪念 · 纵浪 · 大化 · 集 · 欧 · 陆 · 回 · 望 · 巴 · 黎 · 四 · 季 · 风 · 探 · 索 · 的 · 路 · 上

九州图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人视界》丛书

画译中的纪念 / 高莽著. - 北京: 九洲图书出版社, 1997. 2

ISBN 7-80114-170-9

I. 画… II. 高… III. 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0434 号

画译中的纪念

高 莽 著

出版: 九洲图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省三河市残联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5 千字

印张: 8.875

版次: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书号: ISBN 7-80114-170-9/I·59

定价: 16.00 元

作者简介

高莽



高莽，1926年生于哈尔滨。长期从事文学翻译、文化交流与编辑工作。离休前曾任《世界文学》杂志主编，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外国文学协

会会员。在翻译方面，主要作品有：普希金、

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阿赫马托娃、马雅科

夫斯基、帕斯捷尔纳科等人的诗歌、散文、

剧本翻译；写作方面，曾出版了《久违了，莫斯科》，《诗人之恋》、《妈妈的手》

等散文集；在绘画方面，为中外文学家作

过许多肖像画，被国内外文学纪念馆所收藏。

目 录

人 与 事

茅盾与苏联作家散记 · · · · · 1

寻梦记 · · · · · 12

—— 记田汉、蒋光赤与皮里尼亚克

梅 · · · · · 20

—— 纪念梅兰芳与梅耶荷德

一段不可忘怀的往事 · · · · · 24

—— 梅兰芳与塔伊罗夫夫妇

阿翰林的颂词 · · · · · 28

不谢的花 · · · · · 31

—— 忆苏联朋友谈梅兰芳

苏联友人谈齐白石 · · · · · 38

阿赫马托娃与《离骚》 · · · · · 42

风雨中的会长 · · · · · 45

—— 记齐赫文

我是尼古莱的眼睛 · · · · · 51

—— 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

我出生在四月一日	56
----------	----

——记玛·斯米尔诺娃

克拉拉	59
-----	----

笔 与 画

茅公谈画	64
------	----

为巴金画像	69
-------	----

许广平	72
-----	----

连骨灰也没有留下	74
----------	----

——记田汉

“出土文物”	76
--------	----

——记萧军

往事如烟	78
------	----

——记蔡若虹

“我不是师长……”	82
-----------	----

——记华君武

叶浅予的身影	86
--------	----

文武双全的方成	88
---------	----

玉瓣	91
----	----

——记曹辛之

画虎高手胡爽齋	95
---------	----

齐白石的门弟子	· 98
---------	------

——记女篆刻字刘淑度

李德伦与笑话	· 101
--------	-------

艺台奇人黄宗江	· 105
---------	-------

闯将	· 107
----	-------

——忆骆公

读 与 写

他像 UFO 闯入苏联诗空	· 115
---------------	-------

沃兹涅先斯基	· 133
--------	-------

叶夫图申科	· 140
-------	-------

艾特马托夫	· 154
-------	-------

诗苑新声	· 162
------	-------

“苏联文学”近况	· 180
----------	-------

俄罗斯文学在崛起	· 190
----------	-------

爱的寄语	· 214
------	-------

编纂普希金抒情诗中译本琐记	· 220
---------------	-------

永远年轻,永远光辉	· 228
-----------	-------

——莱蒙托夫和他的诗歌中译本

《阿 Q 正传》在苏联	· 242
-------------	-------

中国国画在苏联	· 246
---------	-------

情 与 理

冷与暖	· · · · ·	· 252
卵石	· · · · ·	· 254
美人鱼?	· · · · ·	· 256
爱好与教训	· · · · ·	· 261
我爱书	· · · · ·	· 267
意外的发现	· · · · ·	· 273
后记	· · · · ·	· 276
编后记	· · · · ·	· 278

——走进译人的视界

茅盾与苏联作家散记

茅公是我国最早介绍外国文学的中国革命作家之一。从开始文学事业到生命最后一息,他一直关注俄罗斯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它的诞生、发展与演变。茅公没有见到“苏联”国家的解体,不可能论述苏联文学的终结。但他一生中写了不少有关苏联文学与苏联作家的文章,还根据英文转译了苏联作家的一些小说、剧本与论文,说明他对苏联文学的极端重视。

早在20年代,茅公在《小说月报》杂志任编辑期间,便多方面地介绍了老一辈的俄罗斯作家,同时注意十月革命后活跃于文坛的中年作家,如高尔基、勃洛克、别德奈等,以及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等年轻的文学新人。

如果说,他的早期有关苏联文学的介绍是根据外文资料撰写的。那么1946—1947年,茅公首次访问苏联时,有机会接触法捷耶夫、马尔夏克、卡达耶夫、苏尔科夫、西蒙诺夫等人,回国后发表了一些访问记,那已是他与苏联作家直接交流的成果了。

新中国成立后,前十几年,我国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当时新中国与苏联关系密切,两国人民互访频繁。茅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经常接待苏联文艺界使者。那时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联络部的一名工作人员。由于工作关系,时而担任茅公的翻译。茅公出国访问时,有几次也随同前往,有幸和他多日生活在一起。许多年过去了,很多事忘记了,但茅公的崇高品

德和朴素的作风以及他渊博的知识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头脑中。有些活动,有些细节,也许不曾见诸于报刊,现根据自己零星的回忆做些追述,或许能为关心与研究茅公的专家与读者提供一点历史资料和线索。

在高尔基纪念馆题词

1959年春天,茅公率领作家代表团出席苏联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主人盛情邀请中国作家们去参观高尔基故居。

“高尔基故居还没有开放。”热情的主人亲切地说:“我们相信中国朋友会有兴趣。”

13年前,茅公初访苏联时,参观过高尔基世界文学院和高尔基博物馆,当时,高尔基故居还没有改建成纪念馆。高尔基逝世刚过10年,其中有四年苏联处于艰苦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战争结束后,经过几年的筹备,纪念馆已基本完成。这时邀请茅公等中国作家去参观,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礼仪。纪念馆位于卡恰洛夫街6号,门前挂着一块牌子:“阿·马·高尔基1931年至1936年的故居”。

这是一栋灰色的二层楼房。正门不通行,出入走旁门。我们刚一敲门,门就开了,一位中年妇女笑盈盈地向茅公等中国作家伸出手来,自我介绍道:“我叫佩什科娃,纳杰日达·阿列克谢耶芙娜……”也许她怕中国来客弄不清她的身份,又加了一句说明:“高尔基的儿媳妇。”陪同人员补充说:“她还是画家。”后来,在门厅里陪同人指着一幅高尔基坐在写字台前的画像说:“这就是纳杰日达·阿列克谢耶芙娜画的。”茅公看了片刻,略有所思,说:“我们曾经发表过这幅作品,谢谢您!”这意外的喜讯使纳杰

日达·阿列克谢耶芙娜十分高兴，她的热情更高了。

纳杰日达·阿列克谢耶芙娜亲自为茅公等人做向导。她说：1931年春天，高尔基从国外回来，政府便把这座小楼调拨给他当寓所，因为环境比较幽雅，住房也比较宽敞，适宜于写作和从事社会活动。高尔基在这里前前后后住了四年。他去世后，他的家人仍然留在这栋房子的二层，楼下的四个房间，恢复了高尔基在世时的样子，作为纪念馆了。

高尔基的儿媳可能发现客人们用惊异的目光观察这座有些怪异的建筑物，便解释道，原来主人是莫斯科富翁里亚布申斯基。他为自己修了一栋现代主义的建筑物，门窗等有意都不对称，室内很多家具也是原房主留下来的。高尔基搬来后表示不用改建，也不要为他购置新家具，所以诸多陈设并不能代表高尔基的兴趣。不过，这房子一经高尔基占用，也必然会受到他的影响而发生一些变化，无形中留下很多他的劳作痕迹。

纳杰日达·阿列克谢耶芙娜在高尔基的工作室里指着一把中国红木椅子说，椅子是阿·托尔斯泰赠给他的。她告诉茅公和其他中国客人：“高尔基每天收到的来信和稿件很多，每封信他都争取自己答复，不烦秘书代劳，尤其是给青年作者回信。他寄书或寄稿也往往亲自装封包扎，写好地址，最后才请别人送交邮局发出。”茅公听到这时深有感触，说：“鲁迅先生也是如此……”

茅公很细致地观看桌上的东西：眼镜、铅笔、纸张、剪子、胶水、烟灰盘……他说，十几年前，他在高尔基博物馆里见过这些东西，还看过高尔基字迹工整的手稿。这次茅公在案头上发现了一个木雕像。茅公端详了一会儿，意味深长地说：“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也有一个木雕像，既像鲁迅又像高尔基。”当年在上海时，茅公和鲁迅先生住前后街，他经常到鲁迅家里去，可能这时又想起了他们并肩战斗的日子。

高尔基的工作房间通向寝室。寝室不大。一张单人床放在寝室中间，一头顶着墙壁。床头栏杆上系着一个挂钩，可以吊挂电灯。床头左上方有一个小型壁上书架，上面摆着几本外国名著俄译本。这是由高尔基提倡并由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中的几种。茅公在寝室逗留的时间较长，了解了该套丛书出版的情况。高尔基原定出版四十种，他去世后计划扩大了，如今已出版一百多种。我想这时茅公思考的是如何加强我国对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介绍与研究。

参观之后，纳杰日达·阿列克谢耶芙娜捧出一本纪念册，请茅公签名留念。茅公想了一下，题了几句话：

“高山仰止，来访故居，万世文宗，宏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灿烂之花！”下面是他的签名和日期：“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八日。”也许由于在场人交谈的干扰，茅公把“山”与“止”字写颠倒了，为此在题词后特注了一句：“‘止’与‘山’字对调。”

回旅馆的路上茅公讲到成立这类纪念馆的重要性和对后代人的教育意义。

与苏尔科夫谈海明威

1955年10月，茅公在西总布胡同作协外联部接待了以苏尔科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

1946年，茅公访苏时与苏尔科夫初次相识，一别就是九年。苏尔科夫(1899—1983)是诗人，那时他脱下军装不久，负责大型《星火》周刊，兼任《文学报》编委。20年代末，苏尔科夫是拉普领导成员，这次他来华的身份是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茅公与苏尔科夫如今都是各自国家作协的领导人，都属于老一辈作家。茅公比他年长三岁。那天，老友相会十分热情，谈

得很随便。

记得话题转到海明威(1899—1961)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时,二人的观点出现了差距。海明威是他们同辈的美国作家。茅公肯定海明威在这篇小说中的成就,说主人公老人的性格和心理刻画都有深度、有功力,而且说《世界文学》杂志准备发表。苏尔科夫则认为海明威的作品带有悲观和宿命论的色彩,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读者有消极影响。他似乎是从苏美关系的角度对待美国文学的,认为《老人与海》不值得推广。我为他们二人做翻译。当时给我的印象,苏尔科夫似乎尚未读到这篇小说,所以只是泛泛讲些对海明威的作品的想法,并没有涉及《老人与海》的具体内容。

《老人与海》于1956年在茅公主编的《译文》(即后来的《世界文学》)杂志十二月号上发表了,译者朱海观。读者对小说反应甚好。当时处处以苏联为榜样的时代,刊物上能发表这样一篇作品是要有一些突破精神的。一两年以后,苏联的《外国文学》杂志也发表了《老人与海》。可见我国像茅公这样学识渊博、融通中外,具有独到见解的老一辈作家,对待外国文学的评价要比苏联同行更有远见,更加公道。可惜这种评价在当时常常由于政治原因而不能推广。

派中医为柯切托夫治病

1959年10月,苏联作家柯切托夫(1912—1973)率代表团来华访问。那一年他只有47岁,但他1952年发表的描写列宁格勒造船工人茹尔宾一家三代人的经历,热情歌颂主人公继承革命传统和忘我劳动的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已有了中译本,而且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好评。

柯切托夫到京后,茅公接见了代表团,进行了非常融洽的交谈。后来,柯切托夫不止一次回忆茅公,说茅公是位可尊可敬的长者,是位不寻常的大作家,他本人对茅公一直怀着深深的敬意。

柯切托夫访华期间,有时座谈和参观之后,显得劳累。他说他患有风湿病,身体有些虚弱。访问武汉期间他病倒了,可能旧病复发或水土不服,只好休息几天。当地主人派来医生给他治疗。他利用这个机会向医生了解了中药的一些知识。回国后,不到一年,他又病倒了,病得很厉害。他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西医已束手无策。他可能想起了中医。当时他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也许是通过组织关系,向我国有关单位请求用中医协助为他治疗。我不知道全部过程细节,但最后是茅公以文化部长的名义,派了老中医杨济生(?)先生带着一位女助手,前去莫斯科。传说,杨医生为他检查时,说他是中风,拿出半尺长的银针,声明:倘若针扎进去经过一段时间没有反应,他也就无能为力了。在几位西医专家睽睽注视之下,在众人的焦急中,两个小时过去了,柯切托夫侧身动了一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中医这种回春妙术表示惊叹。经过三个月的针灸治疗,柯切托夫恢复了健康,这件事使他铭记终身。他对我国我党和茅公极为感激。

60年代初我去苏联时,柯切托夫请我到他家作客。他盛赞中医针灸的神能,详详细细地讲述杨医生在他身上针灸的情况,说没有茅公及时派中医来,他的命也许就难保了。

柯切托夫的病愈,使我想起了1959年春,茅公在克里姆林宫休息大厅里与苏联老作家列昂诺夫(1899—1994)的一次谈话。茅公是在1946年年底与列昂诺夫相识的。茅公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列昂诺夫说少年时代跟莫斯科的一个中国人学到一套小戏法,并当场表演了一下。茅公对他的表演一直未忘。

这次，茅公看到列昂诺夫脸颊不住抽搐，嘴也有些歪，便主动建议他不妨用中国针灸治一治，还说：倘若需要，他愿意尽力予以帮助。列昂诺夫表示感谢，说现在有事在身，过一段时间再看。可能由于其它原因，列昂诺夫并没有来我国。我不知道他面颊的抽搐后来是否消除了，但柯切托夫的中风确实由于中医的针灸治好了，这事在苏联作家中作为中苏友谊的佳话流传甚久。

茅公热心关注他人健康的事例很多，无论是我国作家还是外国朋友，他都铭记在心。

读多尔马托夫斯基的诗有感

叶·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1994)是苏联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和苏维埃国家的风风雨雨息息相关。赫鲁晓夫上台以后，随着对斯大林的批判，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振动与反响。苏联社会里各种思想的搏斗异常激烈，文艺界出现了一批肆无忌惮地否定历史中革命传统的人。沉渣泛起，搅得天昏地暗，多尔马托夫斯基有鉴于此，写了一组诗《我们的年代》，以老一代的名义对青年人的虚无主义进行了批判。这组诗发表在苏联《十月》杂志1962年第11期上。我将这组诗译成了中文，译文发表在《世界文学》杂志1963年第1期上。其中《岁月冲掉了逃兵身上的污点》一诗中有这么几句话：

从士兵的事业中
无法把三十年的历史勾销。
他们忠勇地奋不顾身地战斗，
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大道。
我们在生活中

没有欺骗任何人，
如果自己受过骗，
那是我们应得的教训。
至于无病呻吟的
逃避子弹的家伙，
他没有权力来作结论。

茅公对此诗颇有感触，1963年2月13日他写了一首律诗赠给剧作家赵寻。诗前有段注释：“读叶甫盖尼·多尔马托夫斯基《我们的年代》组诗之一《岁月冲掉了逃兵身上的污点》有感，为广其意。”茅公的话表明他是借题发挥，议论天下大事，矛头针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茅公诗中最后四句是：

8

倒行逆施詎能久，
革命风云正怒吼。
他年历史有公论，
小丑终究是小丑。

多尔马托夫斯基生前知道他这组诗曾译成了中文，还通过汉学家艾德林向我表示过感谢。他并不知道这首组诗引起茅公的重视。如果他得知伟大的茅盾在他的组诗影响下写了自己的律诗，他一定会感到无比的自豪与骄傲。

会见费定

1959年5月，苏联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时，苏联老作家康·费定(1892—1977)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大会闭幕后

的一天下午，茅公前往费定家去祝贺。茅公比他小四岁，都是六十开外的人，如今也都担任作协领导的重任。费定住在一栋房子的楼上。穿过门廊，进入餐厅，向左一拐，就是他的书房了。这里有他的写字台、书架。费定和茅公一样，文质彬彬，客客气气。前不久，他的夫人去世了，现在只身一人。唯一的女儿，在国外工作，只能偶尔回来看看他。他自己照料自己。那天，两位老作家并排坐在长沙发上促膝攀谈，交流创作经验与计划，当时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们谈到自己创作上的情况。茅公说，他现在担任一些行政工作，写作时间很少。还有，我国文艺政策强调表现工农兵，而对这些人他恰恰不熟悉。他所熟悉的是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费定认为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人。随着每个人的成长，对熟悉的人的看法也会变更，他自己在这方面深有感受。他劝茅公不要搁笔，世人期待着他的新作。他们谈得很投机，很随便，是两位真正的大作家在谈心。一缕夕阳透过窗户照在他们身上。我很想把这个镜头拍摄下来，便征求茅公的意见，他高兴地说：“主人如不反对，就拍吧！”费定非常愿意有个合影，他准备把房间收拾一下。正在这时，门铃响了。费定去开门。来的是作协负责日常工作的书记苏尔科夫。一阵握手，一阵问候，之后，当他们再回到原座位上时，阳光已经过去了。而我那架光圈只有“5.6”镜头的照相机，在没有闪光灯的情况下，是拍不出影像来的，只好作罢。二位老人都说，将来再拍。可惜他们从此再没有见面，并先后离开了人间。

茅公是我国文学战场上的一名宿将。在外国文学介绍与翻译领域里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不但关心我国作家，同样也关心外国朋友，所以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誉。

新中国成立后，他身为文化部长与中国作协主席，肩负重